

数字经济发展助推消费升级

李杨鑫*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经济结构和居民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立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宏观愿景, 扩大内需、助推消费升级是当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的政策取向。因此,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基于 2012-2018 年中国数字经济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 构建双向固定效应 (Two-way FE) 模型, 考察数字经济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反应,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有效助推居民消费升级。居民消费升级主要体现在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优化和消费品质提升三个方面。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潜在的内生性风险, 并通过稳健性分析证明实证结果针对不同的指标都是稳健的。基于研究结论, 本文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可以考虑适度倾斜资源以推动当地数字经济发展,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科技人才培养, 加大市场监督引导, 进而发挥数字经济对消费升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数字经济; 消费升级; 消费水平; 消费结构; 消费品质

DOI: [10.57237/j.wjeb.2022.01.003](https://doi.org/10.57237/j.wjeb.2022.01.003)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Boosts Consumption Upgrading

Li Yangxin*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on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residents' lives. Based on the macro vision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boosting consumption upgrading are the current and future policy orientations for a long time.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Digital Economy Index and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from 2012 to 2018,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wo-way FE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consumer consumption upgrading. The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 reflect tha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The upgrading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consumption level, optimization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improvement of consumption quality. In this paper,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is used to solve the potential endogenous risk, and the robustness analysis proves that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robust for different indicators.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can consider appropriate tilt of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digital economy, accelerat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increase market supervision and guidance, and then play the role of digital economy in promoting consumption upgrading.

*通信作者: 李杨鑫, liyangxin2017@163.com

收稿日期: 2022-11-29; 接受日期: 2023-01-06; 在线出版日期: 2023-01-12

<http://www.wjeconbus.com>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Consumption Upgrading; Consumption Level; Consumption Structure; Consumption Quality

1 引言及文献综述

互联网革命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空间和海洋等技术,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机的发明和电力的使用之后的又一次重大革命,给全球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得益于互联网革命,实现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前,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在激发消费、拉动投资、创造就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荆文君和孙宝文,2019 [1];张勋等,2019 [2];钱海章等,2020 [3];赵涛等,2020 [4];陈兵,裴馨,2021 [5];程广斌等,2022 [6])。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相关资料显示¹,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为22.4万亿元,2019年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6.2%,按可比口径计算,同比名义增长15.6%,远高于GDP增速。

另一方面,在我国构建“三驾马车”协调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中,消费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突显出来(易行健和周利,2018 [7];张勋等,2020 [8];蒋艳辉等,2020 [9])。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自2020年5月以来多次提出“面向未来,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²,而双循环构建的关键在于调整经济结构,尤其是居民消费升级。应对世界经济下行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冲击,“新发展格局”将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而消费作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提升居民消费升级对于稳定国民经济、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数字经济在“新发展格局”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数字经济是否驱动了中国居民消费升级?对于这些问题,学者们已经从多个方面重点讨论了数字经济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何大安(2020) [10]认为数字经济能够更高效的配置市场资源,通过对供给与需求侧大数据的分析,能够引导厂商投资那些需求侧亟需的商品,从而促进经济内循环战略的实现。赵涛(2020) [4]测度了中国2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水平,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高质量发展,激发大众创业是数字经济释放高质量发展红利的重要机制。类似地,孟祺和沈佳瑜(2021) [11]从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就业角度探讨了其可能对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左鹏飞和陈静(2021) [12]认为数字经济具有技术通用技术、范围经济性和融合创新性等特点,因而能够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和经济效率途径推动经济增长。

对于数字经济与消费的关系,现有研究指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深刻改变了零售模式,从而影响居民的消费支出和消费方式。牛亮(2021) [13]认为数字经济推动了直播电商和社交电商等新的零售模式,但是这种新的零售模式在外部突发事件频发的情况下还不稳定。周孟珂(2021) [14]认为随着移动互联网引起的数字经济发展使得消费者获取消费信息更加便捷,消费者的自主消费权力得到极大拓展。任保平和苗新宇(2021) [15]认为数字经济塑造了新的消费主体和消费模式,因而必须通过努力优化消费环境、完善消费保护体系,从而促进消费规模扩大。易贰和马静(2021) [16]发现数字金融与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因而应当加快发展数字金融和电子商务。

笔者通过总结上述文献,发现当前学者主要就数字经济对零售模式、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展开研究,还较少有学者直接探讨数字经济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并且在相关研究中对消费升级的测度不够全面。基于此,本文将研究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具体影响,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品质三个方面检验数字经济的影响,对于全面认识数字经济的社会影响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理论途径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介绍模型构建、变量设置及数据

1 参见《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007/t20200702_285535.htm。

2 参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1125/c1001-31943814.html>

来源; 第四部分详细讨论实证结果; 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2 理论分析

要考察数字经济与中国居民消费升级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弄明白居民消费升级的具体内涵。居民消费升级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消费水平的提高, 指的是消费支出总量的增加; 二是消费结构的优化, 指的是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呈现由生存型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 三是消费品质的提升, 指的是消费者对于商品与服务的消费由低端转变为中高端(蒋团标和张亚萍, 2021 [17])。三者的区别在于消费水平升级代表居民消费“总量”的增加; 消费结构升级更侧重于消费支出“类别”的丰富, 追求不同类型的商品与服务; 消费品质升级则侧重于追求更高“层次”的同类型商品与服务。针对这三种内涵, 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四个方面来作用于消费升级。

第一, 数字经济推动了新零售模式的诞生, 极大地便利了居民的消费。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时代下最具代表性的新零售模式。一方面, 极大地便捷了消费者的消费。大量的商家将商品呈现在线上销售平台供消费者挑选, 消费者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卖家的描述和其他消费者的评价在短时间内了解商品的性能, 缩短了消费者的购物时间。另一方面, 极大地节约了消费者的消费成本。电子商务使得商品交易环节实现了最大程度的简洁化, 厂商可以直接通过物流将商品送到消费者手上, 不仅降低了中间交易成本, 而且也使得消费者更容易与厂家直接沟通了解商品性能, 从而更易达成交易。

第二, 数字经济推动了消费品供应链的完善, 丰富并保障了市场供给。首先, 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的兴起, 引起了地方政府和各家电商平台的重视和新一轮的资源投入, 能够有效提升线上产品的供应规模, 降低各家参与方和生产者的经营成本。其次, 那些产品新颖且备受消费者喜爱的相关产家, 通过线上平台能够迅速的被其他潜在合作商家和消费者所熟知, 因此其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扩大上下游产品的相关生产与服务。此外, 随着线上供应商家规模的扩大, 与之相配套的线下物流配送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线上销售的产品能够迅速配送到消费者手里, 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满意度。

第三, 数字经济推动了消费保障体系的完善, 更

好地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方面, 消费者购买产品后 7 天无理由退换和退换货运费保险服务在电商平台得到大面积推广, 使得消费者在发现所购买的产品与商家原先的描述不符合后, 能够及时、便捷地退换货。另一方面, 新零售模式下售后评价模式得到迅速建立,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后, 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感受进行在线评价。使得消费者可以先通过线上评价, 了解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品质, 从而做出消费选择。那些产品质量与线上描述不相符的企业在遭受大量退货或大量差评后将面临被市场所淘汰的风险, 从而迫使线上商家主动提升产品质量。

第四, 数字经济缓解了消费者和产品供给者的资金约束, 促进消费支出的扩大。数字经济与金融密切结合, 使得数字经济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有效缓解金融机构与金融资金需求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运营风险和运营成本, 致使金融机构能够将更多的信贷资金发放给消费者和产品供给者, 缓解消费者和产品供给者的信贷融资约束, 从而促进市场供给的扩充和消费规模的扩大。此外, 那些资产规模小的电商企业也能够更多获取资金支持, 有利于完善整体电商供应链, 从线上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购货服务。

因此, 本文提出三大假设:

- H1: 数字经济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 H2: 数字经济有助于优化居民消费结构。
- H3: 数字经济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品质。

3 模型构建、变量设置及数据来源

3.1 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Two-way FE)模型, 考察数字经济与中国居民消费升级之间的关系。通过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 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具体的模型设置如下:

$$Consume_{i,t} = \beta_0 + \beta_1 Dex_{i,t} + \beta_3 X_{i,t} + \varphi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Structure_{i,t} = \beta_0 + \beta_1 Dex_{i,t} + \beta_3 X_{i,t} + \varphi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Quality_{i,t} = \beta_0 + \beta_1 Dex_{i,t} + \beta_3 X_{i,t} + \varphi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Consume_{i,t}$ 代表居民消费水平, $Structure_{i,t}$ 代表居民消费结构, $Quality_{i,t}$ 代表居民消费品质, 以上三个指标用以衡量居民消费升级的水平; $Dex_{i,t}$ 代表数字经济指数; $X_{i,t}$ 代表一系列可能直接影响被解释变

量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收入水平、家庭成员、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户籍等变量； β_0 代表截距项； φ_i 代表个体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的影响； μ_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用来控制特定年份的宏观经济因素和政策变动等随时间变化的因素的影响； $\varepsilon_{i,t}$ 代表随机扰动项。

3.2 变量设置

1. 被解释变量。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消费升级，分别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品质三方面来衡量。其中，居民消费水平（*Consume*）采用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来表示；消费结构（*Structure*）由家庭设备支出、文教娱乐支出、交通通讯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和其他消费支出的总和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来衡量；消费品质升级（*Quality*），部分学者提出以享受型商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来表示，但消费结构指标中已经间接反映了享受型消费的支出情况，同时，考虑居民在衣、食、住、行方面的支出在总消费中占重要比重，因此，本文采用居民在食品支出、衣着支出、住房支出等生存型消费支出与社会平均生存性消费支出的差距来衡量，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消费品质升级。

2. 解释变量。本文采用财新智库发布的数字经济指数来衡量各省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3. 控制变量。为了确保回归的准确性，本文进一步加入了其他可能直接影响被解释变量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收入水平、家庭成员、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户籍。其中，收入水平（*Lnincome*），采用家庭人均收入来衡量；家庭成员（*Family*），采用家庭常住人口总数来衡量；性别（*Gender*），采用虚拟变量来表示，1代表男性；婚姻状况（*Marriage*），1代表未婚、2代表已婚或同居、3代表离婚或丧偶；受教育程度（*Edu*），采用1-9来衡量居民个人受教育程度，数字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户籍（*Urban*），采用虚拟变量来表示，1代表城镇户口。

3.3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部分数据来自中国财新智库发布的数字经济指数，反应了除港澳台及西藏以外各省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第二部分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具有全国代表性的CFPS始于2010年，之后每两年进行一次，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教育的变迁。为考察数字经济与中国居民消费升级之间的关系，本文将以上数据合并为2012-2018年的微观面板数据，此基础上剔除异常值，并对所有连续型变量的分布两端进行1%水平的缩尾处理。

3.4 描述性统计

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消费水平最小值为7.987，最大值为12.626，表明各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具有较大的差异；消费结构最小值为0.035，最大值为0.89，表明各地区居民消费结构悬殊较大，中位数0.329低于平均值0.357，说明半数以上的居民的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消费品质的平均值-0.038和中位数-0.319都小于0，说明半数以上的居民的消费品质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并且各地区的消费品质差异较大。从数字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最大值为0.920，最小值为0.015，说明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非常不均衡；中位数为0.277，平均值为0.295，说明半数以上的居民所在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收入水平最大值为12.899，最小值为6.551，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为悬殊。从其余控制变量来看，居民的家庭成员、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户籍都具有较大的差异。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消费水平	10.410	10.441	0.916	7.987	12.626
消费结构	0.357	0.329	0.198	0.035	0.890
消费品质	-0.038	-0.319	0.928	-0.948	4.620
数字经济指数	0.295	0.277	0.192	0.015	0.920
收入水平	10.440	10.629	1.214	6.551	12.899
家庭成员	3.779	4	1.857	1	21
性别	0.551	1	0.497	0	1
婚姻状况	1.349	1	0.617	1	3
受教育程度	2.697	3	1.334	1	9
户籍	0.271	0	0.445	0	1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豪斯曼检验

本文拟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为检验固定效应

的有效性，本文首先进行了豪斯曼（Hausman）检验，原假设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回归系数没有系统性偏差”，即随机效应是有效的。表 2 为豪斯曼检验的结果，其中，FE 代表固定效应回归，RE 代表随即效应回归，DIFFERENCE 代表比较系数的差异。

表 2 豪斯曼检验结果

变量	FE	RE	Different	S.E.
消费水平	1.152	0.892	0.260	0.062
数字经济指数	0.145	0.210	-0.065	0.009
收入水平	0.055	0.088	-0.033	0.007
家庭成员	0.050	-0.056	0.106	0.022
性别	-0.043	-0.055	0.012	0.018
婚姻状况	0.013	0.074	-0.062	0.007
受教育程度	0.016	0.235	-0.219	0.049
户籍	8.351	7.228	1.122	0.115
Prob>chi2 =0.0000				

根据表 2 的统计结果可知，P 值小于 0.01，可以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二者存在系统性偏差，所以本文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但考虑到标准豪斯曼检验的最大缺陷是它要求随机效应估计量是有效的，即扰动项服从独立同分布，如果随机效应估计量得到的聚类稳健标准误明显不同于系统默认标准误，则可能出现检验的偏差。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进一步采取了过度识别检验，检验结果仍然在 1%的置信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进行回归估计是合理的。

4.2 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利用总体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产生的影响，表 3 报告了基准回归的结果。表 3 的第（1）列显示，数字经济指数的系数为正，并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居民消费水平（*Consume*）的提高。数字经济指数提高 1 个单位，可以推动居民消费水平提高 0.711%。从控制变量来看，收入水平和家庭成员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居民收入和家庭规模对消费水平也有促进作用。性别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男性的消费水平相比女性更高。表 3 的第（2）列显示，数字经济指数的系数为 0.118，并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经济有助于推动居民消费结构（*Structure*）的优化。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不断上升，居民变得更加理性，更愿意改善其消费结构。从表 3 的第（3）列发现，数字经济指数

的依然系数为正，并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高达 1.345，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极大地提升居民消费品质（*Quality*）。控制变量中，收入水平和家庭成员的系数也显著为正。

综上所述，实证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提升居民消费品质，换言之，数字经济有助于推动居民消费升级。

表 3 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消费水平	消费结构	消费品质
数字经济指数	0.711*** (0.163)	0.118** (0.048)	1.345*** (0.087)
收入水平	0.145*** (0.011)	0.004 (0.003)	0.130*** (0.013)
家庭成员	0.054*** (0.008)	0.015*** (0.002)	0.024*** (0.009)
性别	0.056*** (0.025)	0.007 (0.007)	0.044 (0.029)
婚姻状况	-0.052** (0.022)	-0.016** (0.006)	-0.002 (0.025)
受教育程度	0.012 (0.009)	0.005* (0.003)	0.014 (0.011)
户籍	0.014 (0.051)	-0.011 (0.015)	0.061 (0.059)
常数项	8.425*** (0.130)	-5.214 (5.663)	-2.019*** (0.149)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6003	15696	16496
R ²	0.140	0.084	0.109

注：回归中采用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下同。

4.3 内生性分析

虽然本文选取了较为系统的控制变量，尽可能地减少其他因素对回归结果带来的干扰，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仍有可能致使回归存在偏误。首先，遗漏变量问题仍然可能存在，比如居民个人对未来的异质性预期和消费的差异化偏好等因素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其次，数字经济与居民消费随着社会经济进步具有同向变动趋势，并且某一地区的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和优化，可能会推动数字经济的扩张和发展，从而导致双向因果关系。另外，可能存在测量误差问题，虽然财新智库和 CFPS 数据都来自官方机构普查，但是数字经济和消费等具体数据仍然可能存在测量偏差，同时居民个人往往倾向隐藏详细的财务状况，导致统计结果出现偏差。

因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

内生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指数 (*Dex*) 与其均值差的三次方作为工具变量 (曾卓然等, 2021 [18]), 既保证了工具变量和内生变量高度相关, 又可以从技术层面削弱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 即工具变量具备外生性。表 4 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的系数均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F 统计值远大于 10, 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并且相关检验结果证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因此该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在加入工具变量之后, 模型 (1) 的解释变量在 10%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模型 (2) 的解释变量在 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模型 (3) 的解释变量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且回归系数的方向都为正, 说明内生性问题并没有造成系统性偏差。具体而言, 第 (1) 列和第 (3) 列的回归系数较基准回归有所降低, 说明内生性问题放大了数字经济对消费水平和消费品质升级的作用; 而第 (2) 列的回归系数却有所上升, 表示内生性问题低估了数字经济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就控制变量而言, 主要变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程度都没有系统性变化。

表 4 内生性分析

变量	(1) 消费水平	(2) 消费结构	(3) 消费品质
数字经济指数	0.422* (0.220)	0.161*** (0.065)	1.114*** (0.257)
收入水平	0.147*** (0.011)	0.004 (0.003)	0.128*** (0.013)
家庭成员	0.051*** (0.008)	0.015*** (0.002)	0.024*** (0.009)
性别	0.057** (0.025)	0.007 (0.007)	0.049* (0.029)
婚姻状况	-0.051** (0.022)	-0.016** (0.006)	-0.010 (0.026)
受教育程度	0.012 (0.009)	-0.005* (0.003)	0.013 (0.011)
户籍	0.014 (0.051)	-0.011 (0.015)	0.059 (0.059)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982	6898	7189
R ²	0.139	0.083	0.109

4.4 稳健性分析

本节对上文的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前文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验证了数字经济与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正相关性。但是, 仅使用数字经济指数这一指标可能面临着测量误差的风险, 因此笔者引入各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作为替代指标, 对上述分析进行

对照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汇报了互联网普及率的回归系数。由表 5 可以看出, 在更换了解释变量之后, 三个模型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数字经济与消费升级的影响没有发生变化。其中, 第 (1) 列中互联网普及率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第 (2) 列和第 (3) 列中也在 10%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可以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表 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消费水平	(2) 消费结构	(3) 消费品质
互联网普及率	0.009*** (0.003)	0.002* (0.001)	0.003* (0.003)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6003	15696	16496
R ²	0.138	0.084	0.105

注: 模型控制了上文中的控制变量和双向固定效应, 受限于篇幅, 表格仅报告解释变量的系数。

5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数字经济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居民消费升级体现在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优化和消费品质提升三个方面。该研究结果在解决内生性风险后依然显著, 并且对于不同的指标和模型设定都相当稳健, 充分说明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助推居民消费升级。

基于上文的研究成果, 笔者建议政府可以考虑适度倾斜资源以推动当地数字经济发展, 进而发挥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助推作用。具体而言, 首先, 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是否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因此各级地方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 加强引导相关民营资本共同参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并且出台相关支持数字经济建设的相关政策配套服务, 推动当地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进而引领居民消费升级。其次, 特别要重视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 培养和吸引高层次的急需人才, 加强人才能力建设, 加大对互联网投资力度, 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特别是通过加快 5G 商用、大数据模式构建和人工智能应用, 进一步巩固信息技术带来的红利优势。最后,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便捷了消费者的消费, 促进了居民消费升级, 但是新的销售模式下存在大量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到位的情况, 这将不利于数字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因此,政府要加大市场监管,及时更新完善相关市场规则,及时出台相关新形势下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相关法例,引导相关新的市场主体和销售模式得到合理有序发展。

当然,本文的研究分析还存在部分局限性。首先,仅用数字经济指数这一指标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内部差异,数字经济的内部差异对消费升级的差异化影响和作用机制还值得进一步考察。其次,受制于研究时间和数据可得性,本文的模型设定较粗放,并且缺乏细致的异质性分析,尤其是数字经济对消费升级影响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人群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最后,数字经济对国民消费乃至宏观经济运行的作用和影响机制值得再加以扩展和挖掘,对于正确引导数字经济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 [1] 荆文君,孙宝文.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J]. 经济学家, 2019 (02): 66-73.
- [2] 张勋,万广华,张佳佳,何宗樾.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J]. 经济研究, 2019, 54 (08): 71-86.
- [3] 钱海章,陶云清,曹松威,曹雨阳.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 (06): 26-46.
- [4]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J].管理世界, 2020, 36 (10): 65-76.
- [5] 陈兵,裴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1 (04): 141-144+171.
- [6] 程广斌,吴家庆,李莹.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J/OL]. 统计与决策, 2022 (23): 11-16 [2022-12-25].
- [7] 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

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J]. 金融研究, 2018 (11): 47-67.

- [8] 张勋,杨桐,汪晨,万广华.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理论与中国实践 [J]. 管理世界, 2020, 36 (11): 48-63.
- [9] 蒋艳辉,王靖烨,王琳.财政支出、居民消费与区域创新——基于省级面板的实证分析 [J]. 工业技术经济, 2020, 39 (11): 12-18.
- [10] 何大安.数字经济下内循环为主战略的理论分析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0 (12): 36-47.
- [11] 孟祺,沈佳瑜.数字经济与贸易高质量发展——GVC 贸易地位视角下 [J]. 商业经济研究,2021(14):145-148.
- [12] 左鹏飞,陈静.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 [J]. 财经问题研究, 2021 (09): 19-27.
- [13] 牛亮.数字经济新业态促进下的零售业态模式创新——基于组织韧性视角 [J]. 商业经济研究, 2021 (04): 31-34.
- [14] 周孟珂.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消费者权力的提升——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消费者赋权 [J]. 浙江社会科学, 2021 (03): 87-93+86+159.
- [15] 任保平,苗新宇.新经济背景下扩大新消费需求的路径与政策取向 [J]. 改革, 2021 (03): 14-25.
- [16] 易斌,马静,陈曦.数字金融支持、电商嵌入与居民消费升级关系探讨 [J]. 商业经济研究, 2021 (04): 94-97.
- [17] 蒋团标,张亚萍.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机理 [J]. 华东经济管理, 2021, 35 (12): 1-9.
- [18] 曾卓然,韩仁杰,任跃文.企业管理效率、政府补贴与技术创新 [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 (02): 181-184.

作者简介

李杨鑫

1998 年生, 硕士, 研究方向: 财政学.

E-mail: liyangxin2017@163.com